

他没有走——追思杨奇同志

□关国栋

打开10月3日《羊城晚报》第二版，一幅杨奇同志的照片跃入眼帘，旁边的标题是：《粤港著名老报人杨奇先生逝世》。我顿时觉得头顶“轰”的一下，愣在那里……

九九高龄，即登百岁，当属高寿。但他还是走了！

62年前的情景，又现眼前：1959年9月，我调到羊城晚报社工作。南方日报人事处（当时羊城晚报属南方日报领导）的同志带我来到《羊城晚报》总编辑杨奇的办公室报到。杨奇同志对我这个新兵表示欢迎，扼要介绍了《羊城晚报》的基本情况和办报特色，语重心长地强调：采编人员一定要多跑，多看，多思考，多动笔。谈话后，他通知分管采访工作的副总编辑方允过来，把我带去《羊城晚报》新闻（采访）部，交给部主任。

我在杨奇同志领导下，工作近七年。他是报社“一把手”，我是普通一兵，接触有限，但依然感受到他身上的许多长处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指示要求毫不含糊，同时注意结合晚报实际认真落实；思维缜密，考虑周全，工作细致，雷厉风行。他不时深入各采编部门，与大家共商办报之事。我就几次见他来到新闻（采访）部，向主任布置任务或一起商讨问题。有时，他还与在场的记者就具体稿件进行交流。

报社的同志们都愿意参加杨奇同志召开的会议。他在会上作报告或讲话时，内容充实，观点鲜明，分析到位，入心入脑。在小型会议上，他的发言也是有的放矢，句句实在。

杨奇同志十分重视采编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，对于勤奋努力、成绩突出的记者，编辑充分肯定，及时表彰。为提高新闻采访质量，突出晚报特色，他提出了“攻‘新’字关”等重要举措，收到实效。

虽然不分管副刊，杨奇同志对《羊城晚报》上这“半壁江山”经常



杨奇先生自1992年离休返穗定居后，每日读书自遣，安度晚年（资料图片）

关注。一次编委会专题讨论副刊“花地”工作（副刊部负责人及“花地”全体编辑参加），杨奇同志做了针对性很强的发言，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，使大家深受启发。他还利用自己与社会各界联系面广的条件，为副刊扩大影响，邀请省内外文艺界等知名人士来羊城晚报社做客，建立联系，为副刊撰稿。

一般情况下，星期天除出报等值班人员及有采访任务的记者外，羊城晚报工作人员都可休息，但杨奇同志往往例外，星期天也常回报社办公、巡视。《羊城晚报》在“西瓜园”时期，我的单身宿舍（平房）窗外，是从编委会办公的“小红楼”通

往报社大门的必经之路。有一个星期天，我午饭后在窗口闲坐，忽见杨奇同志骑着单车（这是他上下班交通工具）来到窗前，对我交代了两件事情，叮嘱次日转告副刊部负责人，说罢蹬车而去。此时已是十二点多。

十年浩劫，《羊城晚报》首当其冲。杨奇同志“靠边站”，受到打击迫害，于1968年秋天去了英德干校。我与他再见面，已是几年之后。

那天，我在广州搭乘公交车，座满，只好拉住吊环站在通道上，一扭头，发现相隔不远，也是“站住”的一个人，竟然是杨奇同志！

我过去同他打招呼，他见了我也很高兴。原来他已从肇庆调回广州担任广东省出版局领导。寒暄数语，我已到站，只好挥手道别。

又过了几年，再次见面，是在香港。《羊城晚报》复刊之初，我与同事出差香港。当时，杨奇同志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。我们一行前去拜访，他热情接待，根据我们此行目的，介绍了有关情况。由于他的指点帮助，使我们的活动能够顺利开展。

杨奇同志是广东省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，我是八届常委会委员。届满卸任后，我们都参加了当时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联谊会。已回广州定居的杨奇同志，常和我一起去参加联谊会的活动。联谊会组织的报告会、讲座，只要人在广州，身体情况允许，他大都会出席，认真听讲。他晚年听力下降，有时听不清讲的内容，便向邻座询问。联谊会组织的参观考察活动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，他也争取参加，看到广东城乡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日新月异的变化，深受鼓舞。在参观珠海横琴地区时，面对已规划好、尚未开发的土地，眺望近在咫尺的澳门，杨奇同志若有所思，对我说：横琴现在还看不出名堂，将来会有大的发展。

2018年，杨奇同志将新书《当代岭南文化名家——杨奇卷》送给我（这是他送我的许多著作中最后一本书）。捧读这本书，我对杨奇同志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，也更加崇敬。

杨奇同志走了，但他也没有走。因为他留下的革命信念、崇高理想、求实精神、勤奋作风等宝贵遗产将继续伴随我们，鼓舞我们奋进。

忆我的杨奇伯伯——缆绳系岸，满是关爱

□黄晓

壹

我曾经是杨伯伯眼里的小孩子。用丰子恺的话来说就是：“小时候真傻，居然盼着长大。”我不仅盼着长大，还努力想去花花世界、身不由己地坠入滚滚红尘。也曾以为自己找到了诗和远方，在诗的海洋中安居乐业。殊不知，人生的航船上，一直有一条不起眼但结实可靠的缆绳。缆绳系岸，船舷就是每个人的童年。而我的童年获得的各种关爱中，有一份就来自杨奇伯伯。

杨伯伯曾是我爸爸在疗养院的院友。我上幼儿园时，爸爸得了重病，手术后，姑姑和姑丈邀请爸爸到肇庆市七星岩风景区疗养院疗养。那时，姑丈在肇庆宣传部工作，杨伯伯在肇庆担任宣传部部长。我爸爸住疗养院时，杨伯伯刚好也在那里疗养。姑丈就介绍他们认识了，两人一见如故。从此，爸爸多了一位挚友，我多了一位亲切的长辈。

爸爸对我一向持开放态度，但我上初中时，在妈妈要求下，爸爸开始教我写毛笔字。他自己书写了叶剑英的一首诗，做成字帖给我练习。那首诗叶帅的诗我至今记得：借得西湖水一湾，更移阳朔七堆山，堤边添上丝丝柳，画幅长留天地间。

听到杨伯伯去世的消息后，我又想起了这首诗，忽然生出一个新问题：为什么熟读古典诗词、沉迷古代碑帖文字研究的爸爸，为我书写、制作字帖时，没有选那些千古经典名句，也没有选自己的诗作，却选了叶帅的一首风景诗？我唯一的猜想是：肇庆七星岩风景区的美丽山水，加上姑姑和姑丈的亲情与杨伯伯的友谊，帮助爸爸尽快康复，所以爸爸对那山水那些人，充满感激。如今看来，在七星岩风景区那段时光，的确是爸爸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

「没收」手机

□周芳

母亲走后，父亲独居。每逢节假日，我们姐妹三人都会携家带口回到父亲家，说说话，做点好吃的，既陪了父亲，老少三代人情感上也有了交流。

可我发现，每次聚在一起，父亲满腔的期盼总是得不到预期的回应。除了忙饭的人，其他人都是围坐一桌各看各的手机，父亲挨个问我们上班的情况，问外孙的学习情况，得到的都是很敷衍的回答。我看着我心酸。前些日子回家，我每个人都到齐了，从厨房里端出一个闲置的搪瓷托盘，“啪、啪”地拍两下，认真地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回家的人必须交上手机，除非紧要的事，一律不准看手机。”

“啊——”大人惊讶，孩子更是哭

贰

那晚和好朋友苗燕电话里聊天，她忽然说：“刚刚见到家人群里的信息，四叔今天上午（10月1日）去世了！”

苗燕的四叔，就是粤港新闻出版界的老前辈、杰出的老报人和出版家杨奇，我的杨伯伯。消息来得太突然。

2018年，我和苗燕分别从美加回广州探亲，我在广州只逗留两周。我还抽出一周时间，跟苗燕和她的朋友去了云南旅行。留在广州短短的日子里，本来还想跟苗燕去拜望杨伯伯的，竟来不及了，我只能托去探望杨伯伯的苗燕，代我送上问候，把他们的合影再发给我看。我们总以为，下次还有机会。但如今，我已经无法再见到杨伯伯了。

杨伯伯去世的消息传出后，朋友圈里一片怀念之声。有朋友转发原广东省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后人的怀念：“他精神矍铄地给我们讲述东纵的故事，慈爱谦逊地给我们签名赠书……”看到这些文字，我只觉得太熟悉——小时候他也经常送书给我呢。

对杨伯伯“粤港老报人”的身份，我因为年纪小，印象并不深。我最熟悉的杨伯伯的身份还是“出版人”，我也最爱他这个身份。他从肇庆调回广州后，担任过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。那时各省市都有一家出版社。改革开放后，迎来出版业的黄金时代，有了很多专业出版社，如羊城出版社（主打文学）、岭南美术出版社（主打艺术）、广东教育出版社（主打教育和教材）等等。大概在这段时间，杨伯伯担任了省出版局局长。那时每次见面，他都会送给我爸爸一大堆书，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鲁迅日记》《鲁迅书信集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

的书《鲁迅印谱》（钱君匋刻），等等，可能因为知道我爸爸热爱鲁迅作品。让我最欢喜的，是每次他还会像变魔术一样，拿出一小堆书给我，多是较薄、开本也小得多但色彩更鲜艳的书。如果临近节假日，还会送我不同样式的文具。

直到成年后，无论我是在广州还是在北美，我都十分喜欢读书给别人作为礼物，或许就是源于杨奇伯伯当年的关爱之举。几个礼拜前，我还在微信朋友圈里点赞了波士顿一位十岁混血小男孩的照片：他面对一桌美食，吃得津津有味，手臂却夹着一本英国作家Roald Dahl的儿童书。他的母亲解释说，那是他生日时一位叔叔送的礼物。我当时就感叹道：“那叔叔真是会送礼的人。我小时候也有个送我最多书的人，他如今九十多岁了，我还一直记着他的好，他送我的书。”这个九十多岁的人，正是杨奇伯伯。

先是个个喊着嘴，小外甥甚至趴在桌子上佯装睡觉。但一会，孩子好动的天性就按捺不住了，你戳我一下，我拍你一下，几个小孩就嘻嘻哈哈闹起来，吃了亏的孩子还躲到外公那里，请求救援。老父亲又要和我们聊天，又要给孩子主持公道，忙得应付不过来，不时哈哈大笑。等到吃饭时，大人孩子互相谦让、承让，一桌人更是聊得欢。

叁

现在，如何培养孩子成了全民热门的话题，在各种补习班、才艺班、兴趣班之外，我一直认为，更重要的还有：让孩子感到被爱、被重视、被平等对待。杨奇伯伯充分给予了我这样的待遇。记得有一次父母带着我到杨伯伯家赴家宴（那时他已调回广州），到了杨家，见到两对比我父母年纪更大的夫妇已经在座。杨伯伯介绍说，他们分别是香港两份报纸的主编和夫人（记不清是《大公报》、《文汇报》还是《新晚报》，总之是这几家报纸的其中之一）。在座的只有我一个小孩子。杨伯伯却不忘时时关照我，还为我介绍厨师特制的一道炖汤，问我汤的味道怎样。

每当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回忆童年往事，我总是会想起杨奇伯伯。我上中学后，才朦胧感觉到杨伯伯是广东省文化艺术界的“中轴神经”，也渐渐意识到杨伯伯真正是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。但杨奇伯伯不仅对亲人、朋友、下级、部属事事礼貌周到，对我这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子也一样是无比关爱。难怪我所熟悉的那些与杨伯伯往来的“鸿儒”们，谈起杨伯伯，都十分尊敬，说他是一位儒雅的文人、一位谦谦君子。

“谁言芳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感恩在我童年时，给我关爱与尊重的杨奇伯伯。愿杨伯伯在天堂开心快乐！

回家陪老人，不但人要在，心也要在这。往深处讲，这也是个礼貌问题，是对老人的尊敬。”一番话下来，几家大人声附和，孩子们做着鬼脸，也算是认可了。

再以后，每到周末，都不用我端盘子，大人小孩的手机主动放进托盘里。小外甥还自嘲道：“这样也好，固定一个地方放手机，回家不会忘记定。”老父亲更是用心，周末总会桌上摆上水果、瓜子，说是怕我们无聊，大家边聊天边吃。

中秋节时，我因为值班，最后一个到家。一跨进家门，小外甥端来托盘，笑着说：“阿姨，交上手机，洗手吃饭。”一家人顿时被他的样子逗乐了。在我们家，远离手机的好习惯，就这样养成了。

“乡音”征文

岁月中的豆腐

□王侏晓

我对豆腐情有独钟。

童年的我，虽寄养在外婆家，但周末或假期还得回家帮忙干活。那时家里穷，长年靠外婆接济。但母亲很会持家，总能把父亲从湖南煤矿寄回来的那点钱用在最该用的地方。见我回家，母亲总想做点什么给我吃，又苦于囊中羞涩，只买得起五分或一角钱的豆腐，回来煎得金黄金黄，就成了我的快乐晚餐。有时豆腐卖完了，只能买到几分钱的豆腐头，但用生葱一炒，也是能让我口水滴断肠的美味。

豆腐买回来后，一般先放起来，要等母亲劳作回来后“炮制”。我和弟弟总等不及，馋到忍不住了，就偷偷下手，挖一个角分来吃。如果能往豆腐角里滴几滴酱油和香油拌匀，那就是人间极品。若再拌上半碗饭，更是美不可言。可很多时候挖一个角总不解馋，于是又挖了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个，等到一刀豆腐没了四个角，我们再也不敢下手了，因为豆腐已被我们折腾得惨不忍睹。不过，母亲绝不会说我们半句，没丁角的豆腐她也一样能煎成饭桌上的美味。

童年时我的肚子好像没饱过，虽没有经历父辈那些苦难岁月，但日子也挺苦的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学会了偷家里的米，拿到圩上换东西吃。大多时候，我都会换豆腐。换来豆腐却没有配料，我只能生吃。生吃豆腐很容易拉肚子，我很庆幸从没中过招。但母亲终于发现了我的偷米——或许她早就发现了，只不过放任我而已——她没打我也没骂我，只说了一句“拿豆腐回家，加上盐油吃才不会吃坏肚”。之后我发现她转过身偷偷地抹眼泪。

我那时以为母亲一定是怪我变坏了没出息才哭的。直到成家后，我才读懂母亲那转身抹眼泪的满腹辛酸：她是恨自己无本事，连小小的豆腐也满足不了儿子。我这才理解，父亲远在湖南理不了家，她一个女人撑起一头家够苦的。

我进城读书的前一个暑假，有一天又忍不住偷米出圩换豆腐吃。这一次，母亲当着

我的面哭了，并从枕头下摸出一叠折得整整齐齐的一分二分、一角两角的零钞，狠狠地撒在地上，大声叫我拿去买豆腐。我知道，那是给小妹买奶粉的。小妹是捡来的，母亲无奶喂她。因为要给小妹买奶粉，家里好久没买过豆腐了。望着满地零钞，我大声地哭了。哭过后，我再也不偷米了。至今我仍特别钟爱这白白嫩嫩的豆腐，每周不吃就会觉得少了点什么。若到外面吃饭，我必会点一盘干煎豆腐。老婆常说，豆腐有石膏，吃多了会生结石，但我照吃不误。儿子也

说，豆腐这种一元几角的便宜货，用得着那么痴情吗？我总是笑而不答，要不他又说我要给他上什么艰苦岁月的政治课了。儿子有幸生活在一个富足的年代，永远无法体验豆腐在岁月中打磨、发酵、沉淀出的美味。



扫码聆听上期《消失的木履声》粤语播音

《“乡音”征文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并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，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

一颗被遗落的丝瓜籽

□贾美芳

今年春天，院子里的葡萄树旁边，竟然长出了一棵丝瓜苗。兴许是去年冬天，我为了用老丝瓜洗碗，把没用的丝瓜籽扔进垃圾桶里时遗落的种子吧。本想顺手拔掉，可是，小丝瓜苗绿油油的，长势喜人，就由它自生自灭了。

有一天，忽然发现，小丝瓜苗长成了一根细细的藤蔓，顺着葡萄树爬上了花墙，茎蔓在空中摇晃着。爱人便找来几根铁丝，在院子里拉网。“这么纤细的丝瓜秧，还能爬满你的网？还想吃它结的丝瓜？”可爱不跟我争辩，自顾自地干他的活。

爱人特别喜欢吃丝瓜，我不喜欢，也许是小时候吃太多的缘故吧。小时候每年春天，父母亲总是在墙角地头随便丢下几颗丝瓜种子，每到夏天，丝瓜就开得满架金黄，我们最喜欢在丝瓜架前捉蝴蝶。但到秋天，它拼命地结果，我们就开始天天吃炒丝瓜，以至于后来一到炒丝瓜，我就给母亲甩脸子。

母亲说：“丝瓜恋秋。”果然，立秋不久，丝瓜就发疯似的长，藤上生蔓，蔓上长丝，分出好多藤蔓。爱人合理分配，让它们大有铺满小院之势。黄绿色的丝瓜花，像一把把小

伞，很快，一根根细小的初果就吊在瓜架上了，给小院增添无限生机。

爱人天天仰面朝天，点数着架上的丝瓜，说用不了几天，就能吃到炒丝瓜吧。今年秋天雨水多，连续下了几天雨后，小丝瓜竟全部落了，曾经油光发亮的叶子也纷纷枯干。我说：“看来你的炒丝瓜要泡汤了，想吃去街上买几根吧。”爱人却只顾用他的喷水壶“滋滋滋”地喷着瓜架上的藤，不搭理我。

说来也怪，几天后，丝瓜竟然“返老还童”，枝蔓上又长出了新叶子，一片片枫叶似的，微微晃动。小黄花又开了一层，很快又有几根小丝瓜在架上垂着。有一天下班回家，发现爱人竟然摘了一小堆丝瓜。吃着自家院子里收获的丝瓜，他满足而幸福。看着他享受的样子，我也有些动心。自己种的丝瓜，想吃就吃，还是天然有机的。

我在网上搜了一下，发现丝瓜有很多药用价值，且美容养颜，有“美人水”之称。怪不得书画大师齐白石多次让丝瓜入画呢。而长老的丝瓜，去种子后，拿来刷锅洗碗，不沾油、不伤手，也是天然的洗刷利器。一颗被遗落的丝瓜籽，就这样实现了它生命的最大价值。

成长型心态

□刘希

那一年，母亲辛辛苦苦养的大肥猪，临出栏时突然死了。我心里肯定很伤心，便特意跑回家看望她。哪知道我刚安慰完，她却笑着回答我：“死了就死了吧，以后出门再也不用惦记着它的一日三餐，倒是不愁了。我准备去你姨娘家住上一阵子。”她的眼睛里，竟然洋溢着快乐的神采。

“妈，你真想得开。”我望着她似乎毫不在乎的样子，开始打趣。“想不开有什么用？还不如往好的方面想呢。日子总要过去，难不成我要哭几天？再说哭几天那猪也不会活回来。”母亲又笑了笑。

听到母亲的话我如释重负。她一直觉得，一些坏事的两方面也会是好事，有失必有得。我曾在一本书里看到，母亲这种对待事情的态度，是典型的“成长型心态。”成长型心态的人，往往对任何的事情都会持有一种动态的眼光来对待，积极、阳光。

记得我那年中考，英语考砸了，心情极度郁闷。虽然上了高中分数线，但我对考试成绩很不满意，好一阵子走不出来。我怨恨自己粗心大意，连最基本的几个语法知识点都弄错了。母亲见了，说：“这次因为

粗心考差了，倒是件好事。以后考试时你肯定会记得这次失误，做题就会小心点。”我起初并不能理解她的话，后来上了高中，参加了高考，我认真地做题，生怕犯当初粗心大意的错误，这才渐渐明白，吃一堑，长一智，失败果然是成功之母。

又想起那一年，父亲官场失意被迫辞职回家。亲戚都替父亲惋惜，父亲也觉得自已命不好，整天一副郁郁不得志的样子，动不动就冲我们发脾气。母亲却觉得父亲从官场退下来是一件好事。她认为，老本分的他不适合在官场上谋生，再干下去只会得罪更多人。再说这些年父亲因为工作很少陪伴家人，趁这当儿可以弥补的爱弥补回来。母亲整天乐呵呵的，面对父亲的遗憾和懊恼，她苦口婆心地耐心开导，渐渐地父亲也走出了阴影。他珍惜和我们共处的时光，重新找了份工作，用心生活。

母亲说：“事情总有两面性，有坏的，就会有好的。把眼界放宽一点，心胸开阔些，路就会越走越宽。”我们也受她的影响，用“成长型心态”来生活，看淡成长中的失意，坦然面对挫折，不沮丧，不灰心，勇往直前。